

評介郭雙林著《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 ——兼述民國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

洪 健 榮

作 者：郭雙林

出版地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0年5月

頁 數：362頁

一般而言，學界大體將明清時期西方地理知識影響傳統地理學的歷史過程，區分為明清之際與清中葉以後兩個階段。前者不外以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義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入華傳教為開端，後者主要以清仁宗嘉慶十二年（1807）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至廣東佈道為嚆矢。¹在前後兩次的西學東漸史上，世界地理知識每擔負起開風氣的先驅和啓民智的前導。明清之際若是，近代中國的變局，亦大致如此。學者梁啟超（1873-1929）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論及西學東漸與清代地理知識演進的趨勢，曾有一段頗為精闢的分析：

自晚明西士東來，始知「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而竺古者猶疑其誕。海禁大開，交涉多故，漸感於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於是談瀛之客，頗出於士大夫間矣。蓋道光中葉以後，地理學之趨嚮一變，其重心

* 感謝張銓津學長與衣若蘭學姊提供相關的資料。

¹ 王家儉，〈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1807-1861）〉，《大陸雜誌》，1969年，第6期，頁188。

蓋由古而趨今，由內而趨外。²

梁啟超指出清中葉前後造成地理知識轉變的背景因素，扼要說明了中外接觸的關係促使時人對於五大洲世界的瞭解日益擴大，西方地理知識的引介也因此蔚為風潮，以致醞釀出林則徐（1785-1850）的《四洲志》、魏源（1794-1857）的《海國圖志》、徐繼畲（1795-1873）的《瀛環志略》之類講究詳今識外、知己知彼的世界史地著述。時勢所趨、流風所被，邊域或海外地理知識一度成為道咸時期的「顯學」³，揭示近代中國變局的歷程。

有鑑於地理知識與近代中國變局的互動關係，至為密切，歷來學界對於相關資料的搜羅輯錄，相當重視。首開先例者，為清末學者王錫祺（1855-1913）於光緒三年至二十三年間廣搜涉外文書、輿地外紀與使外見聞約一千四百餘種，編輯成《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其中涵括為數不少的域外、海外乃至五大洲世界地理的內容。這部集大成式的資料匯編，大略呈顯出清代地理知識的演進趨勢與傳承脈絡，也體現了西學影響下的傳統地理學所產生的各種變化。⁴此外，舉要如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書社先後出版由鍾叔河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收錄鴉片戰爭迄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人出訪歐美與日本的記錄數十種，提供我們瞭解當時知識份子的親身觀感及其對於傳統地理知識的反省。浙江人民出版社於一九八六到一九九〇年間接連出版譚其驤主編的《清人文集地理類編》第一至六冊，一些有關域外世界或海外地理的論述也輯錄其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陸續於民國六十一、七十三、七十五、七十七、七十九年編刊《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至五輯，收錄資料時間自道光元年（1821）到宣統三年（1911），實為掌握晚清時期在西力東漸的情勢下，導致時人世界觀念轉變的重要資料集。

當然，深度的了解仍須依靠學術研究的進展，然而，長期以來中文

²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頁352。

³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52-355。

⁴ 于希賢，《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頁216-219。

出版品涉及西學東漸與清代地理知識演進的探討，大多是依附在鴉片戰爭、涉外關係、經世思潮、西方意象、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近代史學與傳教史之類的論述環節中，隱約地呈現出來⁵，有時散見於中國地理學史的通論性作品裡⁶，或者傾向於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在敘述主要人物的學術背景時附帶處理。自民初梁啟超推崇魏源《海國圖志》與徐繼畲《瀛環志略》乃「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識，實自此始」⁷，迄今二、三十年餘來，學界相當重視魏源、徐繼畲的研究，探討其地學研究、世界意識、經世思想、海防觀念、生平事略等方面的學術論著，粲然可觀；二書的比較研究，也成為中外學者關心的焦點之一。⁸尤其針對魏源地理學成就的論著，可說是不勝枚舉，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民國53年）⁹、美國學者 Jane Kate Leonard 的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⁵ 參閱《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50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專輯中多篇論文的回顧與分析。實際的論述情形，可舉要參考如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二版）；杜石然、林慶元、郭金彬，《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科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蕭致治主編，《鴉片戰爭史：中國歷史發展中第三次社會大變革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顧衛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張豈之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⁶ 參閱王庸，《中國地理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年）；于希賢，《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胡欣、江小群，《中國地理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趙榮、楊正泰，《中國地理學史（清代）》（上海：商務印書館，1998年）。

⁷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55。

⁸ 例如章鳴九〈《瀛環志略》與《海國圖志》比較研究〉、洪九來〈《瀛環志略》的特色——與《海國圖志》的比較〉、大谷敏夫〈《海國圖志》與《瀛環志略》——中國近代的始刊啓蒙地理書〉，皆收入任復興主編，《徐繼畲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57-173；182-192；193-199。

⁹ 除了此書之外，王家儉長年鑽研魏源的生平與思想，包括：〈《海國圖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而徐繼畲的研究, 則以美國學者 Fred W. Drake 的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一書廣受矚目¹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由任復興主編的《徐繼畲與東西文化交流》, 搜羅了近十餘年大陸、臺、港、日、美學者的相關論文凡三十八篇, 多面性地探討徐繼畲其人其書的歷史地位。在編者所撰〈徐繼畲研究述略〉一文中, 整理出歷來涉及徐繼畲與《瀛環志略》的研究概況和中外各家的論述觀點, 提供有志者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¹¹

除了魏源、徐繼畲之外, 以其他關鍵性人物的地學研究或對外思想為中心的研究, 如閻小波、黃順力與葉賽梅申論清前期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楊炳南《海錄》、郁永河《裨海紀遊》的海防意識、地理知識或世界觀念¹², 王爾敏闡述姚瑩((1785-1853))撰著域外地志《康輶紀行》、《中外四海地形圖說》的成就及其對世界情勢的用心¹³, 李國祁考察自強運動前後朝野官紳特別是馮桂芬、奕訢、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左

志》對於日本的影響》,《大陸雜誌》,第32卷,第8期,1966年4月,頁12-18;《中國歷代思想家·魏源》(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魏源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2月再版);〈魏源的著述及影響〉,《湖南文獻》,1987年,第1期,頁16-19;〈魏源的水利議——兼論經世學家修法務實的精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1990年6月,頁183-208;〈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1期,1993年6月,頁155-172。

¹⁰ 中譯本見德雷克著,任復興譯,《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北京:文津出版社,1990年)。

¹¹ 任復興主編,《徐繼畲與東西文化交流》,頁480-504。

¹² 閻小波,〈《海國聞見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珍貴文獻〉,《福建論壇》,1993年,第3期,頁44-46;黃順力、葉賽梅,〈略論清代前期沿海地區士人對世界的認識——以閩、粵、浙為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頁24-30。

¹³ 王爾敏,〈姚瑩之經世思想及其對於域外地志之探究〉,收入《近代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201-229。

宗棠、丁日昌、沈葆楨、王韜等人的西方觀念¹⁴，吳翎君、楊玉聖則從政策背景與心態觀感的角度，探討清末具有時代自覺的一些知識份子、政府官員有關美國史地的撰述及其對中美外交關係、美國政經文化的認知。¹⁵近五十年來有關鴉片戰爭前後個別人物地學研究的學術行情與參考書目，在蕭致治主編的《鴉片戰爭與林則徐研究備覽》（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一書中有概要的回顧和介紹。

顯而易見的，個案專論部份的成果堪稱豐碩，然而，這些研究雖富有具體而微、見微知著之功，猶難免於見樹不見林之憾。相形之下，學者專注以近代地理學史的整體脈絡為主題的研究，雖不乏其人，但為數不多。從前引梁啟超空谷足音般的論述，到一九三四年陳觀勝在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的碩士論文“The Growth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West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開啓風氣以來¹⁶，海峽兩岸學界後繼的相關研究，如王家儉〈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1807-1861）〉一文秉持「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可說是明末清初時期之繼續，也可說是近代新思想的先驅」的觀點，系統地羅列和提要這時期世界史地知識的傳播媒介，包括中外人士出版的專書及報刊雜誌計六十餘種，進而檢討其影響層面舉凡史地知識的增進、新時代的瞭解、科學技藝的認識、西方政制的觀感、對於自強思想的啓示等。¹⁷陳振江的〈晚清輿地學與史學研究述要〉一文，概論當時經世致用學說的風行與西方列強勢力的壓迫，富國強兵、變法圖強的需要促使世界地理學研究的興起，具體反映在鴉片戰爭前後多種記載世界情況的史地著述。¹⁸李健超在〈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中，闡述

¹⁴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1989年6月，頁175-240。

¹⁵ 吳翎君，〈晚清中國朝野對美國的認識〉，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6年6月；楊玉聖，〈鴉片戰爭時期中國人的美國觀〉，《史學月刊》，1994年，第1期，頁51-54。

¹⁶ 引見燕京大學歷史學系，〈本系歷屆論文畢業題目表〉，《史學年報》，第3卷，第1期，1939年12月，頁202。

¹⁷ 王家儉，〈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1807-1861）〉，頁188-198。

¹⁸ 陳振江，〈晚清輿地學與史學研究述要〉，《南開史學》，1991年，第1

具有理論水平提高、研究方法改進、西北邊疆地理研究異軍突起之特點的近代地理學，游移在內憂外患、師夷制夷與西學東漸的時代氣氛中，過渡到中西地理學的交匯、新式地理教育的施行、地理研究機構的設置而逐漸轉向現代地理學的進程。¹⁹艾素珍的〈清末自然地理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清末人文地理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二文，依據近代學科分門別類的原則，羅列出晚清時期出版的自然、人文地理學譯作的簡目，進一步分析這些著述的內容特點、形成原因與社會功能。²⁰另外，鍾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一書，檢視當時邁出國門、接觸西方與放眼世界的社會菁英，透過地理著述、出使日記或旅外書信介紹外國的情勢之餘，如何思考中國在地球之上、五大洲中的去從問題，連帶反映出他們的憂患意識與世界關懷。²¹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中大量載錄清末傳教士在華出版的中文書刊與中國官紳譯介的西學專著，探討知識份子、各譯書局、洋務機關與教會學校的翻譯事業及其對西學傳播的貢獻，剖析中國社會的反應與世界認知的改觀²²，有助於我們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理解有清一代涵括地理知識在內的西學整體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從中體察西方地學新知與近代中國變局的互動關係。

人們政經文化活動的拓展，往往影響傳統地理學的轉折及發展²³，西學東漸與清代地理知識的演變，實聯繫著大清帝國對外關係的離合進退，攸關知識份子對於國家安危暨世界情勢的認知和考量。從時局世變與思想文化的互動層面，影響晚清世界地理觀念的轉變並促使地理學研究的

期，頁 149-166。

¹⁹ 李健超，〈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 年第 2 期，頁 225-241。

²⁰ 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中國科技史料》，1995 年第 3 期，頁 16-25；艾素珍，〈清末人文地理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中國科技史料》，1996 年，第 1 期，頁 26-35。

²¹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²²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²³ 曹婉如，〈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幾個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頁 242-250。

進展，作為研究考察的焦點，實為一發人深省的學術史課題。然而，相對於明清之際西方地理知識主要透過耶穌會士東傳的歷史情境²⁴，晚清時期由於國際局勢、中外關係與近代學術的複雜性，略顯得缺乏研究客體與資料掌握的明確性，增強了研究上「非不為也，是難為也」的困難度，使不少學者望之興嘆、卻步不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郭雙林致力彌補這項學術缺憾，蘊釀十五年的歲月和心思完成《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見該書序，頁 3-6 及後記，頁 360-362），此書的問世不啻貢獻給世紀末的海內外學界，一部意義非凡的近代地理學史專著。

本書的內文除了導言之外，計分六章。導言中作者首先概述明末清初之前中國傳統地理學的具體成就，表現在實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完整的著述體例、系統的製圖理論和強調以中國居天下中心為主的世界觀等四個特點。在近代西方地理學興起之前，中國傳統地理學保有長期的領先優勢。緊接著作者考察明清之際因實學思潮的勃興加以耶穌會士來華，在中國傳統地理學的延續過程中注入新的成分；到了清中葉以降，由於學術風氣的轉變配合上歐洲近代地理學的東傳，導致傳統地理學的另一次轉化，最終形成「中國近代科學的民族地理學」。為了讓全書整體的討論能有效地掌握在西潮的激盪下，晚清地理學的發展趨勢及其對當時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的歷史作用，作者說明「本書試圖從文化史的角度（而不是從科學史或地理學史的角度），對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傳統地理學在當時的發展、變化，近代科學的民族地理學的產

²⁴ 相關的研究概況見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新史學》，1996 年，第 1 期，頁 137-169。另參閱《禹貢》民國 25 年 3、4 合期之「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以及林東陽，〈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收入《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 年），頁 311-378；曹婉如、薄樹人等，〈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文物》，1983 年，第 12 期，頁 57-70；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圖〉，收入山田慶兒主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 年），頁 507-580；陳衛平，〈第一頁與胚胎——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比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5 至 7 章。

生及其在當時所產生的影響做一系統考察，以便弄清地理學在晚清新舊文化交替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處的地位，以便更好地把握民族文化在晚清的發展脈絡。因此，如果從方法上講，本書注重的是宏觀與微觀的結合，而不僅僅局限於對晚清地理學發展過程中的某些技術性問題進行考釋」（頁6）。由此可見，作者著重地理知識與時局世變的相互影響，留意傳統地理學演進的社會文化層面，根據這樣的研究取向與思考架構，貫穿於全書各章節有關自然、人文、歷史地理學與地圖學等內容的論述。

在第一章〈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的傳播〉中，作者依序說明西方地理學在道咸年間（十九世紀二〇至六〇年代）的初步傳入、同光年間（十九世紀六〇至九〇年代中期）的系統介紹，一直到光宣年間（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紀初年）提昇到理論闡述的傳播情形。行文裡除了分辨各時期傳播管道、傳播主體與傳播內容等方面所具備的特色之外，並通觀其中的起落浮沉與得失成效，進一步檢討以文明使者或以殖民主義者自居的傳教士、身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之前導的外國「探險家」與某些真正的西方地理學者，在近代西方地理學東傳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實質的貢獻，最後分析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在晚清時期的蘊生因素且遭致毀譽不一的際遇，顯示當時知識份子面對西方近代地理學內涵的選擇性態度。

第二章主題〈從傳統地理學到近代地理學〉，作者論述嘉道時期傳統地理學因外在環境與內在自覺的交互影響，本身已逐漸出現新的發展趨勢，首先為研究的重心產生由內地轉向邊疆、由古代轉向當代的改變，具體成果包括西北邊疆地理學研究的蓬勃、中俄邊疆地理研究的發軔以及東南海疆暨域外地理研究的蘊釀；其次是研究的目的發生變化，從先前詮經讀史的學風過渡到經世致用的思潮；最後為實地考察法的重獲重視，進而改善乾嘉漢學專注以文獻考據為主的研究取向。道咸年間由於新的歷史條件導致傳統的持續恢復，配合上與西方近代地理學的接觸，傳統地理學的研究重心表現在世界地理與中俄邊疆地理研究的興盛，促使研究範圍的日趨擴大，發展成以外國資料為主要取材對象、多元史料相互考釋並且將中外地理進行系統比較的研究方法，逐漸創造出一種新

的地理著作體例。到了同光時期，隨著邊疆危機、洋務運動、出國考察與西方地理知識的系統傳播等因素，特別是中國從放眼世界正式走向世界，傳統地理學在世界地理、邊區國家地理以及全國性地圖編制和實測等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拓展。作者最後根據大學地理課程、新式地理教科書、地理學專門研究機構、專業刊物、地理學科的體系化與科學研究法的應用這幾項指標，闡述光宣年間經變法維新、庚子新政的推波助瀾，傳統地理學演變成近代地理學的結果。

第三章〈晚清地理學研究與民族救亡〉，作者逐次從地理學研究與邊界談判、前赴後繼的出國考察活動、二十世紀初年的鄉土地理教育思潮等三個層面，申論地理知識具備知己知彼、撫內安外的經世功能，在外力入侵、國難當頭的危機時刻，發揮出維護領土主權、體察世界局勢暨培育愛國情操的實質效應。第四章〈地理學研究與民主、科學思想的傳播〉，敘述近代時期尤其是甲午戰前，涉及歐美各國政治制度、風俗習慣與科技學術的地理學著作，對於民主思想與科學知識在中國傳播過程的作用。就前者而言，舉凡道咸至同光時期的世界地理專著、出使遊記中有關西方議會制度、美國總統制度、司法獨立制度、三權分立原則、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學說的介紹和評判，光宣年間透過地理學教科書系統介紹世界各國政治體制，肯定憲法的制定在民主及君主立憲國家的地位，促使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學說的普及；就後者而論，包括西方近代船艦、槍炮、鐵路、郵電等科技成果，數學、化學、醫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礦物學等門類知識，以及專利制度、商品檢驗制度等促進科技發展的政策措施，從道咸年間迄光宣時期，陸續經由地理專著、出使遊記與教科書在中國社會傳播開來的情形。

第五、六兩章的焦點集中在〈地理學研究與傳統觀念的變異〉，針對當時西學東傳、中國人走向世界與地理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學術背景，作者分別從地方如棋／天運地處到地圓如球／日心地動、五大洲說的普及與大九洲說的重新「發現」、思想界對風水觀念的批判、中國中心觀念的動搖、夷夏觀念的變異、時局觀與國情觀的變異等主題，說明西方世界地理觀念在晚清知識界的傳播過程中，牽連出傳統宇宙觀、意識形態與

價值系統的糾結或調整問題，突顯傳統舊識與外來學說接觸時所衍生的涵化或滲透關係，以及傳統對於國家民族和世界局勢的認知轉變。作者強調這些觀念的革新，有助於晚清內政改革、經濟建設、國家防務與外交事業的推展。

郭氏行文清晰流暢，論證嚴謹紮實，通觀全書以清治時期傳統地理學如何走出傳統、邁向世界為主軸，將重要課題條分縷析成三大部分：首先是從傳統地理學到近代地理學的發展分期、催化因素、傳播主體和體例內容的演變（第一、二章），其次是地理學研究的經世作用與社會影響（第三、四章），最後是地理觀念本身的革新並帶動其它傳統意識的轉化（第五、六章），整體結構從歷史背景的敘述進入到內部觀念的剖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輾轉於為數龐雜、關係零亂的史料之間，卻能綜理全局、層次分明，各部分的論述往往前呼後應、通體相關，令讀者享有一氣呵成、觸類旁通的感受。透過全書抽絲剝繭、有條不紊的鋪陳，有助於吾人窺悉傳統地理學於晚清時期所呈現的若干趨勢，西方史地知識依違在中國學識文化傳承中的滄桑浮沉，乃至於成為政治鬥爭的對象或啟蒙革新、社會改良的依歸，幾經波折，最終奠定在清末民初變法思想以及新式學堂教育課程之「常識化」的結果。作者解說這段歷史過程時，強調「晚清西方傳教士雖然對西方地理學東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主要還是由中國人自己來進行的」（頁36）；針對西方近代地理學的觸媒作用，也就是它在中國傳統地理學過渡到近代地理學的脈絡中所處的地位，作者指出：

中國近代地理學是從傳統地理學發展而來的，而不是從西方簡單地移植過來的，它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強調這一點，並不是要否認西方地理學在近代的影響。可以說，沒有西方地理學的東傳，沒有中西地理學的碰撞、吸收、融合，就不會有科學的民族地理學（頁77）。

換句話說，中西方近代地理學的關係，突顯在前者以寓傳統於創新的方式，在傳統的延續過程中借鏡西方，達成汲新求變的效果。郭氏以傳統地理學本身的發展為主體的論述內涵，一方面令筆者感觸到，晚清時期經由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傳教士彼此的努力下，共同搭起一道可資

溝通的橋樑，易為吸收與轉化的媒介和管道，中國地理學逐漸世界化的同時，西方地理知識也趨向中國化，二者並駕齊驅，相得益彰，這或許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深思的課題。另一方面，郭氏從中國內部問題出發，批判以往學界過度強調西方角色的觀點，也不禁讓筆者聯想起，近來美國學界從「西力衝擊／中國反應」的解釋模式逐漸過渡到「中國中心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動向。²⁵鑒於如此的趨勢，學者羅志田曾呼籲「倘若把視點集中到中國，也應記住衝擊中國的西方是個變量；而西潮入侵中國之時，中國本身的傳統也在變」²⁶，反觀郭著的整體論述，著重於考察傳統舊識本身的轉變，再加以衡量西學新知的影響，這種多方兼顧、主次分明的詮釋方式，為本書最值得我們留意的部分。除此之外，有別於過去大陸學界習以為常的基本理論架構，大體上，作者不再自我局限於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說的意識形態框架，而能落實對史料的論證，採取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以探索晚清時期的地理學發展，與當前大陸學界逐漸重視文化史研究、擺脫馬克思史觀的學術脈動²⁷，頗相契合，由此也反映出一股學術新風氣，正蘊釀而生。

郭氏的才學識見，表現在原始資料的運用能力上，從各章的引用書目中可以看出，作者除了以這時期刊行的中文版世界史地專著為主要取材對象之外，同時也大量徵採清人詩文別集、出使日記、遊記、筆記、書信、傳記、年譜、匯編與官修方志、圖籍、政書、奏議、外交檔案，以及傳教士、教會學校或中國官紳、新式學堂、洋務機構所創辦發行的報刊雜誌、地學譯著、地理學教科書與鄉土課程讀物等等。立論於琳瑯滿目、為數可觀的傳統文獻基礎上，並且廣泛地參酌當前中文出版品相關的研究成果，得以強化整體論述的周延性，這是全書明顯的特點，也是難得的優點。然而，出自讀者求全責備的立場，本書若能對一些外文檔案資

²⁵ 參閱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96。

²⁶ 羅志田，〈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頁1。

²⁷ 劉志琴，〈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頁71-83。

料或世界學術動態多加留意²⁸，也許更可增添資料選取的完備性，擴大與外國學界的對話空間。

總而言之，參互搜討，旁徵博引以求其是，兼具通論性與專論性的特色，整體呈現出西學東漸與晚清地理知識的歷史因緣及其演變軌跡、發展風貌，為郭著的一大成就。雖然在字裡行間有時流露出「以今非古」的色彩，乃至於對某些地理知識來源或觀念背景的陳述偶有誤差²⁹，但畢竟瑕不掩瑜。本書的貢獻不僅開拓出一些新的研究視野，也留下了一些專業領域如方志學與地名翻譯的學術課題、環繞於地理學術網絡與知識社群之類的思考空間，或者如西方地理知識中國化的可能與方式、世界史地的知識建構在近代中國如何進行³⁰、傳統風水理論如何吸納西方地理知識等等具體而微的研究專題，有俟來者，再接再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讀者若將本書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鄒振環的《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4 月）一書對照閱覽，相信更可以對晚清地理學的輪廓，獲得一脈絡清晰的掌握。最近幾年大陸學界有關晚清時期「西學東漸」問題的研究氣氛，漸趨熱絡³¹，即將告別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時刻，我們衷心期盼在針對近代地理學史的學術課題上，能持續不斷有深具世界性眼光的佳作問世。

²⁸ 如 Jane Kate Leonard 的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與 D. R. Howland Durham 的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之內文與其徵引書目，以及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794-796 所列西文書籍目錄。

²⁹ 例如書中提到「中國古代並非沒有地圖思想」，明末清初「知識界不僅對古人的地圖思想熟視無睹，對利瑪竇介紹的西方地圖學說也不能容忍」（頁 240-241），這類的說法若參照祝平一的研究，頗待商榷。見祝平一，〈跨文化知識傳播的個案研究——明末清初關於地圖說的爭議，1600-180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 3 分，1998 年 9 月，頁 589-670。

³⁰ 相關的研究，可參閱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構及其相關論述〉，《興大歷史學報》，第 9 期，1999 年 6 月，頁 175-197。

³¹ 曹世鉉，〈最近五年來關於晚清時期「西學東漸」問題的研究略述〉，《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283-296。